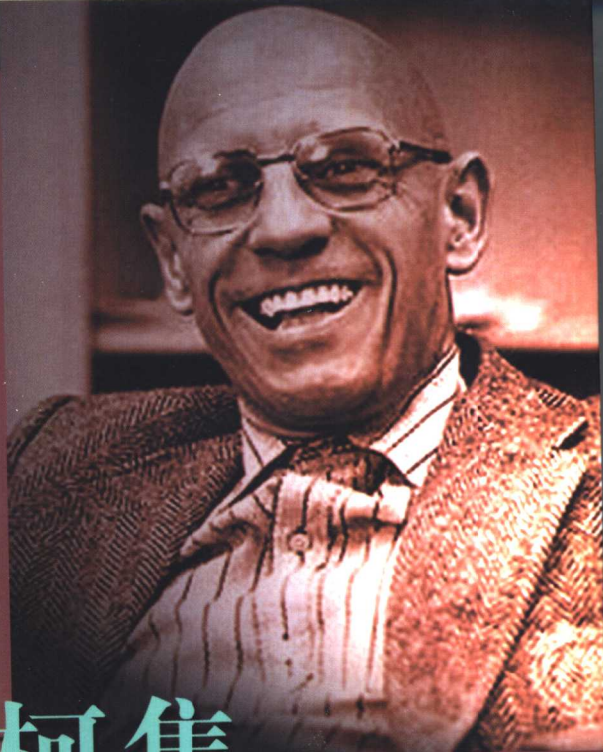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ZOSHIJI WAIGUO WENHUA MINGREN SHUKU



福柯集

FUKE JI

问题不在于改变人们的意识
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而在于改变
有关真理生产的制度、政治、经济规则。

上海遠東出版社

福 柯 集

杜小真 编选

上海遠東出版社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福柯集

编 选 / 杜小真

责任编辑 / 金 水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 上海希望电脑排印中心
印 刷 / 上海长阳印刷厂
装 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 次 / 2003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499 千字
印 张 / 18.75
插 页 / 4
印 数 / 3101-5200

图字: 09-1998-070

ISBN 7-80661-654-3
C · 8 定价 33.8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柯集/杜小真编选.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ISBN 7-80661-654-3

I. 福... II. 杜... III. 福柯(1926~1984)—哲学思想—文集 IV. B565.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013 号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1994
DITS ET ECRITS by Michel Foucault

本书中文版由法国 Editions Gallimard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
方式复制或抄袭。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总序

季美林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这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所谓“一定的时候”，可能短到只指一天，而长则是无限制的，一般的是一年，十年，百年。如果制订几年计划，则在计划结束后，也必须回头看一看，算一下总帐，目的都在回顾前车之覆或不覆以决定后车如何走法。

当前，我们中国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国家和人民，都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再想得远一点，是处在一个新的“千纪末”中。这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时刻。我在很多地方都讲到过，世纪或千纪都是人们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先天的必然性或必要性。试想：如果没有耶稣和耶稣教，哪里来的什么“世纪”和“千纪”。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则是：既然人们制造出来了“世纪”和“千纪”，它们就起了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世纪末和千纪末，现在都不是第一次。然而全国和全世界都承认，眼前的这个世纪末和千纪末同过去的都不一样。由于

但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文精神的发展,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常讲,对世界上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对这些“名人”,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一定要分清他们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以便决定我们的去取。这话实际上已成为老生常谈,不用我说,大家也会明白的。

但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分清精华与糟粕,来决定我们的去取呢?精华与糟粕,说起来明白如日月经天;但实则是泾渭并不分明,而且随时代的推移,有时候还会转化,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我个人的想法是: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以我为主”,不能喧宾夺主;以我们目前的需要为主,决不能陈义过高或过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或者甚至幻想。那样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目前的需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有 12 亿人口的大国,目前正在进行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直接的借鉴,中国没有,外国也不会有。但是,间接的借鉴,就算是“前车之覆”吧,则是能够找到的。我说的“以我为主”,就是指以我国当前的实际为主。外国名人的思想中,对这个当前的实际有用的,我们则吸收之,否则则扬弃之。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探讨与辩论。

但是,非常遗憾——至少我这个喜爱忧天的杞人觉得遗憾——,我发现我们学术界少数人有一种不正之风,“不正”二字加起来就成为“歪”字,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歪风”,还需要再加上两个字“邪气”,才算完整。他们膜拜外国“名人”,或者并非“名人”,或者在成为名人之前已经销声匿迹的“预备名人”,拜倒在这些人的脚下,战慄赧赧。一听到中国人有什么新的理论,就笑得连鼻子都想笑歪,鄙夷之态可掬。用“崇洋媚外”这个词儿,有点刺耳,就改用一个比较文雅一点的“贾桂思想”吧。在这些人眼中,只有外国人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有天才,才有权利来创建新理论。在国际学坛上,中国只能成为一个“无声的中国”。对于这种现象,我实在觉得悲哀而又凄凉,可叹而又吃惊。

我对眼前外国的各种学科的新理论要说知道得很多,那不

是事实,而是吹牛。要说我一点都不知道,那也不是事实,而是撒谎。我对这些新理论了解一个大概起。有些新理论,就像时装一样,“蟋蟀不知春秋”。我曾套用赵翼的两句诗:“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说明我对这些风起云涌转瞬又风吹云散的所谓理论的看法。对待这些新理论,我的态度是:我们必须学习,必须弄通,然后实事求是地予以公允的评价。拒而不学,决不应该;顶礼膜拜,大可不必。后者不应该是一个学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人应有的态度。眼前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彻底扬弃“贾桂思想”,还我一个堂堂正正身。

现在,这一套“书库”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我们眼前了。外国的原作者都可以算是“名人”。书中包含着他们的智慧,当然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经验与教训共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这一套书呢?我个人认为,我在上面刺刺不休地讲的那一些话,就是我们对待这一个书库的准则。首先,书中必有“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识别和利用。其次,这一些书都是“他山之石”,我们用它来“攻”我们的“玉”。第三,“以我为主”,以我们当前的需要为主,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我们要按照我们当前的需要,来细致鉴别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决定吸收或者扬弃,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一点是含糊不得的。如果某一些富于“贾桂思想”的人士,在膜拜当今外国那一批风云变幻,乍起又落的“名人”、“准名人”或“候补名人”之余,又来膜拜这一批已经成为“名人”的大菩萨,则我期期以为不可。是为序。

1997年8月12日,北京



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主编开卷语

林贤治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即将到达 20 世纪的入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继而又红了欧亚一大片,甚至点染了美洲一角。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战后的冷战季节不算太长。及至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那些历史的过客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使东方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保持独特的面貌。

整个当代科学,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

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 年代量子力学的新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 至 60 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 至 70 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 至 90 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时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 20 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有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左右人类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

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一大承担者。

古代的人文学者曾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 15 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进入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寻找灵魂。知识分子以其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 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于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文思想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但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择取一组组断面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外国近代思想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

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汲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这部“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在上海出版,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谨以此书库为人类思想文化生生不息的洪流作涓滴奉献。

1996年7月,广州

编选前言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对现代知识的警觉的和忧虑的意识。

福柯:《词与物》

福柯,这是在涉及 20 世纪西方文明、思想、学术等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名字。60 年代以来,这位“思想怪杰”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学界掀起狂澜巨波,引发深思远虑。

米歇尔·福柯 1926 年生于法国西部的普瓦蒂埃的一个医生世家。他违背父亲要他继承祖业的愿望,中学毕业后考入亨利四世中学的巴黎高师文科预备班。在预备班的两年中,他有幸师从法国新黑格尔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教授依波利特(J. Hyppolite, 1907—1968)。依波利特使福柯迷上了哲学,特别是迷上了黑格尔,他后来的高师结业论文题目就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历史先验性的构成》。1946 年,福柯考入高师。他是一个学习勤奋、天分超常的优秀学生。在高师,他得到哲学辅导老师、后来成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 1918—1990)的赏识,使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所了解和研究。1950 年,福柯通过教师学衔资格考试。获哲学学士学位后,又攻读心理学学士学位。1952 年,再获精神病理学学士学位。此后,他又与心理专家一起进行

实验,1953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病与个性》。在阿尔都塞的安排下,福柯1951年—1955年为巴黎高师讲授心理学,还同时在里尔大学教授心理学和心理学史。也是在里尔,他结识了德勒兹(G. Deleuze, 1925—1995)和拉康(J. Lacan, 1901—1981)。1955年秋,福柯赴瑞典工作,结识了杰出的宗教历史学家杜梅泽尔(G. Dumézil, 1898—1986),这位长期旅居北欧的法国学者,与小他近30岁的福柯从此结下数十年没有丝毫阴影的深厚友谊。杜梅泽尔教会福柯以完全不同于传统诠释的方法或语言学形式主义的方法分析话语的内在结构,教会他如何描述话语的演变以及它与结构的关系。1958年,福柯去波兰华沙创办法国文化中心,后又赴汉堡工作了一年。在前后五年的国外漂泊中,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精神病与精神失常:古典时期疯狂史》,1962年通过答辩,获国家科研中心优秀论文奖牌。1966年,福柯的成名作《词与物》出版,大获成功。1969年从突尼斯教学回来后,又出版了《知识考古学》。他担任万森大学哲学教授,1970年进入法兰西学院任思想系统史教授。《话语的秩序》就是他步入这所大学的就职演说。1975年后发表的《监禁与惩罚》及《性意识史》等,也多是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讲稿。他从不满足于探究现成的问题或已被描述过的研究成果,他要独立进行研究,通过历史讲述他的哲学。这使福柯的书总获成功,总是不同凡响。1984年6月,福柯不幸因艾滋病离世。

福柯被德勒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尼称“福柯的著作是我们世纪最重要的思想事件”,布尔迪厄(P. Bourdieu, 1930—)则认为“福柯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这些赞誉对于福柯并不为过。这不仅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根底之深、范围之广令人惊叹,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探索和那历经艰辛而从未放弃的怀疑精神。福柯的思想针对的不是确定的真理,而是追求对哲学教条保留诊断、批判的自由,摆脱这些教条在我们的生活与思想上压下的重负。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夏特莱(J. Châtelet, 1925—1985)所说:“福柯的著作使人对西方文化的过去产生一种全新的看法,对西方文化现在

谱系学的历史关系出发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并且把他以往著作中的话语—权力辩证法发展成为话语—权力—身体(被历史忘记、却是其基础)三维。身体是铭刻各种事件的平面,语言则标志事件,诸种观念消融着这些事件。《监禁与惩罚》和《性意识史》都是这些思考的结果,由此展开的有关权力的理论阐述,是福柯思想中最引人入胜、也是最有分量的部分。这被称作“生物—权力”的结构表明,权力不再取决于真理,而是真理处于权力的制约之下。

权力是了解用于身体非主体化的各种技术的描述工具,同时又占据了使理性批判得以展开的先验范畴的地盘。福柯认为这种政治理性的新形式的重要性可与17世纪伽利略在物理学中的革命相比。生命—权力于是围绕两极构建:从新的科学而不是从司法范畴出发的人的政治管理,以及对身体技术、学科实践的调整。这样,性就变成权力得以连接身体生命力和物类生命力的建构。性意识与性意识所赋予的意义变成了生物—权力扩展的主要工具。实际上,《性意识史》第一部《求知之志》可说是对17—19世纪的生物—权力研究,而在第二、第三部《快感的享用》和《自我呵护》中,福柯则进一步考察希腊思想和罗马帝国初期的两个世纪中性行为问题化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考察自我关切和自我技术的历史,这是考察主体性历史的一种方式。这样,福柯又修正了方向,回答了《性意识史》第一部出版时一些评论对他的批评,回复到自我的伦理,即以自我生命艺术化为目标的精神追求。我们看到,福柯把性看作从历史角度讲是一种特殊的经验方式来分析的。总而言之,福柯的理论事业完全可称作为一部“思想批判史”,其理论涉及面之广、触及问题之尖锐、融会学科之繁复、阐释论述之深刻不能不令人叹服。

福柯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影响到哲学、文学、艺术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至今常热不衰。要真正准确理解福柯的思想和他的学术研究发展的线索以及他在西方当代思想界的重要之所在,不能不读他的著述。福柯的学术专著大多艰深晦涩,十分难懂。为了让对福柯感兴趣的广大读

者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他的理论思想之中,继而更深入地去阅读他的专著,我们编选了这部《福柯集》。文集收入了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数十篇文章:包括论文、专著前言、访谈录、专题讨论会记录及少量专著章节摘录,内容涉及福柯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涵盖他的学术生涯的各个主要阶段。我们还在附录中收入福柯的挚友、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的两篇论福柯的文章。希望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较之专著更易理解的充满智慧的美文华章,会对读者有所帮助,并能够提高读者阅读福柯原著的勇气。

本文集所选绝大部分译自法国伽利马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言与文》(Dits et Ecrits)。在编选、翻译过程中,法国外交部的伊夫·马班(Yves Mabin)先生提供了可贵的支持和帮助,伽利马出版社的戴尔玛女士也给予了方便。在此特致诚挚的谢意。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郭宏安先生、武汉大学法语系的车槿山先生、秦海鹰女士也在不同方面予以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杜小真

1998年7月